

● 张恒 主编 ●

回眸

审视

前瞻

山西当代作家研究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回眸·审视·前瞻

山西当代作家研究文集

主 编：张 恒

副主编：苏春生

王世杰

侯文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眸·审视·前瞻:山西当代作家研究文集/张恒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

ISBN 7-5004-2618-6

I. 回… II. 张… III. 作家—文学评论—山西—当代—文集
IV. I 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0075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市潮白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298 千字

印数:1-1000 册 定价:25.00 元

前 言

董 国 炎

由山西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学科诸同仁为主、有山西省内文学研究界专家参与而共同完成的这部论文集，是颇有份量的研究成果。文集编定之际，主编张恒教授邀我写个序言。我学识不逮，难以承命。但因忝居中文系主任之职，几年来常思考学科发展问题，有些学问之外的浅见，勉力写出，或可供参考吧。

在中国现当代文坛，山西的文学创作，不但成就可观，而且最具流派特色。中国现当代文坛，流派本来不多，与其他几个流派相比，山西的山药蛋派，特色最为鲜明，且变化中一直保持了稳定。这种文学现象是最值得研究的。文学的特征在于个性，地方性和民族性就是最重要的个性特征。山西文学的鲜明个性，过去可能被简单理解为：努力贯彻领袖讲话精神所致。时迁世变，似乎研究价值也在消减。实际上，这种理解肯定是失之于简单了。山西文学面对现实的价值观念和质实朴健的风格，植根于三晋文化的悠久传统，植根于中西部厚重的社会生活，植根于黄土地民风民俗养育的审美情趣。在新的文化转型期，这种执着的审美选择，也许更有其独特的价值。现在完成的这部论文集，有相当集中的主题和系统性。论题集中于山西现当代作家研究，同时注意向流派研究和文论

研究拓展,提高理论层次。所以这是一部颇有份量的文集。

山西文学的研究价值很高,但过去研究得很不够。其原因相当复杂,既有极左思潮的影响,也有我们自身有欠努力等因素。但过去研究得不够,正给今天的深入研究留下了大好发展空间。中文系的同仁们,应当为此而拼搏。

山西大学是创办于1902年的国立大学,历史悠久,根基深厚。中文系也有同样悠久的历史,相当浓厚的学术基础。很多著名学者曾在我系工作过。我系培养的古文学研究生和汉语研究生,得到广泛好评。现当代文学学科,也是我系的强项学科。这个学科的某些优长之处,是其他任何学科无法相比的。比如,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山西现当代作家当中,前辈作家有很多还健在;当代作家中,更有很多人与我们的研究者是朋友。这肯定会深化我们对创作过程的研究和对作品的理解。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系一些教师,就身兼作家和研究者二任。如姚青苗教授,以其优美的散文创作和小说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如马作楫教授,也是非常成功的诗人,其诗作常葆青春气息和求索精神,有独特的风格和情致。他们虽已退休,但与中青年教师来往频繁,关系密切,言传身教,扶植后进。这对促进学科发展,作用是很大的。

特别值得欣慰的是,我系现当代文学学科,已经初步完成了新老交替,新一代正以强劲势头崛起。文革造成的青黄不接、年龄断档现象,已经得到扭转。我系现当代文学学科现有正副教授8人,其中7人是文革后培养的,平

均年龄不到 40 岁。如苏春生、王世杰、侯文宣等新一代学科中坚,才思敏捷,成果丰硕,朝气蓬勃,来日方长,来日可畏。除了这些高级职称的教师,讲师队伍的成长势头也堪称迅猛。如王春林讲师,授课很受欢迎,专著《话语·历史与意识形态》则以其思考深度和阐释方法引人注目。总体上看,新一代教师在知识结构方面,比老一代教师多有拓展,研究方法也多有变化。他们大多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等名校名院学习过,亲炙名师教诲,深得学术精髓。他们除钻研现当代文学外,还研究美学、创作心理学、艺术风格学等;对现当代文学名著及其影视作品,则进行比较研究。这种拓展和变化,必将有力矫正过去知识面狭窄、方法单一的常见弊端,为学科建设开创新的局面。

我系现当代文学学科,还具有另一个特点,就是研究方向合理、集中,学科特色突出,学术优势明显。这种特色和优势在于:致力于山西文学的研究,文学理论和流派关系来观照山西文学,提高研究的理论层次。几个方向互相关联,互相补充,形成了一个有力的群体。

新的发展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年青一代在理论方面的优势,也已经露出端倪。我们对学科的前途,有理由乐观。目前需要的是,继续狠下苦功夫,甘坐冷板凳,理论上提高水平,资料方面深入挖掘,拿出更优异的成绩。希望青年教师能在自己擅长的方向上,早日冒尖,取得较高的知名度。

21 世纪即将来到,新的社会生活、新的研究要求、新

的竞争局面、作家们新的创作成果,正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自身,勇敢迎接未来的挑战,创造新的业绩,才能不辜负前辈的期望,把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

· 代序 ·

起落在历史的烟雨中

——山西当代文学 50 年抚谈

张 恒

关于山西近几十年的文学，早就想写下点什么，为它曾经的起落，为我心中的感慨。

青少年时代，笔者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对山西当代作家的作品——主要是小说作品，就多有涉猎。后来，又忝据大学中文系教席，辄不免增加了几分有意的追踪和思考。然命笔为文，却总觉立论浮泛，阐述艰难。因此，这个久久徘徊在脑海中的意念也就只有任其徘徊复徘徊了。如今，孰料竟因工作之逼，由我的同事所撰写的这本论文集倏尔已行将付梓，我作为编者似乎也应该说上几句。有此压力，有此机缘，遂只好不揣浅陋，把平日捡撷之片言只语，一鳞半爪，匆促结缀成篇，以为芹献，并权作小序。

1.

研究山西当代的文学创作，“山药蛋派”这是一个首先需要注意也是一个绝对无法回避的概念。山药蛋，即官名所谓马铃薯而俗称“土豆”或“洋芋”者。其为物也，质朴实在，貌不惊人，但也味美价廉；虽难以跻身细饌佳肴之列，却颇受平头百姓、乡间草民青睐，也并非为美食家所不齿。是故以此为例，界定作为一个特定时期山西当代文学的主流派作家与作品——实际上主要是小说作品的艺术

资质与创作特色,也算得上恰如其分、一语中的且妙不可言了。

山西“山药蛋派”文学的形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事。然而,其形成的前奏,其孕育的过程,却是与中国近代历史的动荡步履和烽火旅程分不开的。

众所周知,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的30年,中国新文学的成就堪称有目共睹。“五四”本身所昭告、所弘扬的人文价值即它的民主、科学精神以及这种精神具有的启蒙意义,也越来越被学术界所认同、所定论。然而在当时,随着列强尤其是日本对我中华民族的挤压与蚕食越来越肆无忌惮,随着辛亥以来国人对现实的渐趋失望和对俄国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倾慕,救亡和革命的呼声也日甚一日。国家存亡和大众解放的迫切课题,不仅需要将刚刚萌芽的人文理想暂时置诸客位,更需要最大限度地借助一切力量、一切可能包括一切的社会形态进行战斗。作为文字传播的精彩样式的文学,当然不会被忽视。因此,希望或要求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灭敌的武器,这种观点也就不不断地被人所提倡,所鼓呼。与之相反,则自然会有另外一些人,从“人性”出发,从“审美”出发,而强调和护卫文学在这些方面的原始的功能质。你有你的提倡,我有我的强调,就难免要不断引发互不相让的争论。这些争论的焦点包括:无产阶级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问题,文学的阶级性与超阶级性问题,为多数人与为少数人的问题,服务政治与创作自由问题,战斗文风与自我格调问题,大众化与绅士化问题等等。遗憾的是,尽管在持续不断的争论中,倾向激进的观点每每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从创作的实际看,这种倾向却并没有形成主潮,酿成趋势。梁实秋在抗战时期曾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菜刀可以杀人,但菜刀不是为杀人制造的;他用以比喻,文学可以做工具、做武器,但它本质上却不是用来做这些的。这种观点,其实是很能代表一些文化人的思想心态的。所以,在当时全国相当一部分地区流行的大部分文学,仍然是被后来的一度时期称之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学。

这种状况,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稍后的解放区,才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而完成这种改变的一个重大动因,就是**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作为一位高瞻远瞩的革命家和思想家、战略家,作为一位大手笔的民众组织家和宣传家,他是深深懂得也极为重视文学的工具和武器职能的。“为工农兵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文艺服从于政治”,服从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这就是他认定的文学的最根本的方向和原则。为此,毛泽东号召,“中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向工农兵普及”,“从工农兵提高”。毛泽东所阐述的这些问题,对当时踊跃前来投奔革命的大量知识分子而言,可谓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行动上则纷纷响应。于是,诸如《兄妹开荒》等一大批内容乃至形式全新的作品不断面世。然而,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由于出身的限制,由于过去经历以及所接受的旧文化、旧教育的限制,毕竟有一个思想和感情转变的脱胎换骨过程,有一个真正熟悉陌生生活的过程。因此,他们虽然付出了努力,但要真正写出精品却难免事与愿违甚至弄巧成拙。相反,倒是一些出身农村、土生土长、在人民大众中滚爬过、在革命斗争第一线摔打过的基层文化工作者,则充分体现出了独特的优势,而在实践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方面占尽了先机。后来成为“山药蛋派”中坚的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胡正、束为,几乎都是这样也都是在这个时期起步的。

赵树理年龄较长,创作开始较早,可以追溯到**20年代末**,但真正奠定他的文学地位的发轫之作《小二黑结婚》写于**1943年**,稍后又写了著名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马烽的第一篇小说《第一次侦察》与西戎的第一篇小说《我掉了队后》都发表于**1942年秋冬**,二人时年均**20岁**;三年后他们合作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吕梁英雄传》。胡正、束为的处女作则发表于**1943年**;孙谦

略早，为 1941 年。

纵观他们的早期创作，其艺术旨趣、审美观念、创作心态、风格取向以及功能目的方面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为：首先，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没有任何情感上的芥蒂；接受革命理想、革命路线以及具体的革命任务，没有任何心灵上的游移与障碍；与革命队伍的融合天然浑成，不存在什么改造自身和转换角色的问题；对革命事业则充满了责任感、使命感、奉献感，同时也充满了运用文学武器讴歌革命、抨击反动、鼓舞人民、揭露敌人、配合形势、服务中心的强烈而坚定的自觉意识。其次，他们中的大多数传统的人文与伦理观念积淀不深，接受主体文化与舶来文化的系统教育有限，但却长时间地为中华俗文化所熏陶、所濡染，民间艺术的吸纳至为丰富，美学思想相对单纯而不复杂、不多元，理论的滋养稍显阙如。此外，则极为熟悉下层，生活底子厚实，具有与普通大众特别是农民大众同甘苦、共命运的沉切体验。再加上，他们均心地淳朴，思维敏锐，艺术的悟性与感觉颇佳，对文学的通俗化、民族化灵气十足；而在早年的革命岁月，又建立起较牢固的战斗友谊。正是这一切，为以后“山药蛋派”的形成打下了理论的、实践的乃至人情方面的扎实基础。当然，成亦何败亦何，这一切也为这一流派日后的起落消长埋下了有力的伏笔。

2.

1949 年，在天翻地覆的沧桑巨变中，新生的共和国呱呱坠地。那旧的制度、旧的世界的一切，不仅从政治上、军事上遭到摧枯拉朽般的打击，而且从思想上、文化上也遭到前所未有的荡涤。所以，随着旧的政权的彻底崩溃，在其统治区内生长繁衍的文学，不论它是标榜超阶级的还是脱离政治的，不论它是倡导人性的还是唯美

的,不论它是鼓吹闲适的还是田园式的,甚或是附丽于当道者的被御用、被官化了的,几乎无不面临着被驱逐出社会舞台的可悲亦复可卑的命运。道理一目了然,这些曾经闹热、曾经喧嚣过的文学,与毛泽东所理解的、所设想的文学是大相径庭的,与当时蓬勃向上的时代节拍也是绝对格格不入。而且,刚刚获得解放的国人,包括了各界各阶层,对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差不多都充满着一种发自内心的鄙夷轻蔑之情以及与之断然决裂的真挚愿望。而对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从昔日的革命老区带进来的一切,从扭秧歌到打腰鼓,从《白毛女》到《王贵与李香香》,则无不充满着由衷的拥戴、钦敬和热切的认同感、归趋感。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自感风光难再的旧作家、旧文人遂纷纷改弦更张,他们有的投身于教育,有的置身于学术,有的赋闲于书斋,也有少数人竭力用新的观念、新的素材尝试新作,但成功的并不多。如此,就在特定的时期形成了一个特有的也是巨大的艺术真空,亟需为广大百姓提供的文化食粮却突然面临着青黄不接之虞。

一方面是巨大的艺术真空应该填补,一方面是国人对革命老区形成的倍觉进步、倍感崇仰的新型文学的向往。这,不正是给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人创造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大好机会吗?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共和国的成立,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革命的目的还远远没有达到。因此,随之而来的就是包括贯彻新婚姻法、土地改革、合作化等在内的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鉴于这些运动所承载的艰巨任务,往往必须调动全社会的参与,必须投入所有的舆论工具为之宣传鼓动,礼赞喝采。当然,也就必须要求文学艺术继续遵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这热火朝天的社会变革奋力驰驱。而这,恰恰也是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人的强项,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和拿手好戏。所以,这时候的他们,真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而以惊人的速度与质量成就着骄人的业绩。

1949年,赵树理创作小说《传家宝》、《田寡妇看瓜》;1950年他为贯彻新婚姻法而写的小说《登记》以及1955年写的反映合作化的小说《三里湾》,均轰动了全国。此间,马烽创作的《一架弹花机》、《饲养员赵大叔》、《孙老大单干》、《韩梅梅》等,西戎创作的《麦收》、《宋老大进城》等,都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而孙谦,则以电影文学剧本《农家乐》、《光荣人家》、《葡萄熟了的时候》、《陕北牧歌》、《夏天的故事》等令世人瞩目。胡正、束为也频频出手,迭有佳作。

法国文学大师巴尔扎克认为,“活在民族之中的大诗人”,“应该成为他们的时代化身”,“荷马就是希腊的青天照亮了的棱角”(《论历史小说兼及“费拉戈莱塔”》)。俄国文学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文学“只有当它的发展是以时代的普遍要求为条件的时候,才会得到辉煌的发展”(《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我们的这些“山药蛋派”的作家们,正是在共和国建国伊始的峥嵘岁月中,被时代与历史赋予的难得机遇所“照亮”,而一步一步地走向了他们的成熟与辉煌。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时候作为文学流派的“山药蛋派”还谈不上已真正形成。因为此刻,赵树理、马烽在北京工作,西戎、胡正随军南下四川,孙谦则北去长春,留在山西的只有束为。这时候的他们,除了作品风格与创作方法的一致性外,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所必须具备的地域的相对固定性和构成群体的相对集聚性还远未具备。只是在到了50年代中期,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相继调回故乡,而且均取得了山西文艺界的高级领导职务;赵树理虽仍在北京,也定期回故乡体验生活。工作上密切配合,创作上互相切磋的机会大大增多,彼此在一方文坛有了较大的发言权与指导权,再加上当时的时代气氛的推动;于是,他们长期形成的共同的美学思想有了更自觉的运用和更自信的评估,写农村、写当代、重故事、重白描,强调大众化、民族化、通俗化,让文化低的人能看懂、让没文化的人能听懂,成为他们更明确的共识和更非此无它的追求,并在理

论体系上进行了初步的建设。这样,他们一方面积极实践这种思想,创作更加活跃。**50**年代中期后的五、六年间,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灯芯绒》、《赖大嫂》,孙谦的《伤疤的故事》、《大门开了》,束为的《好人田木瓜》、《老长工》以及胡正的《七月古庙会》等数十篇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和胡正的长篇小说《汾水长流》从三晋大地传向全国。这些作品,大大发展了他们**50**年代早期作品的风格,而以更浓郁的泥土气息、更精妙平实的情节、更鲜活多姿的人物,亮丽着自己的特色,打响了自己的品牌,也确定了他们文学大家的地位与声誉,一时间大有独领风骚、独占鳌头之势。山西作家群,遂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学圈而形成了一道耀眼的风景线,让天下文人刮目相看。另一方面,他们也严格以这种思想为指导、为标准,在娘子关内创办刊物,巩固机制,取舍作品,筛选后继,从而逐渐构筑起一个厚实的、牢靠的但却是单色调的艺术基座。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山药蛋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才能够说是真正形成。山药蛋是山西的土特产,“山药蛋派”一词本系一些自持高雅的人对他们这些作家的轻视不屑之语,后反而被理论界人士借来为该流派定名,也可谓歪打正着、点石成金了。

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山药蛋派”的形成期,实际上也就是它的鼎盛期;甚至可以说,它已经到了巅峰期。

从**1957**年开始“反右”,**1958**年“大跃进”掀起高潮,国家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假、大、空”不断泛滥,极左路线贻害日深,人民衣食艰难,广大农民更是困苦不堪,而舆论界、文艺界却不得不大唱高调。在这种情况下,“山药蛋派”的作家尽管一向以紧跟形势为己任,但严酷的形势却使他们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困惑和迷蒙。因为,一向熟谙民间疾苦的他们所目睹、所感受的农村现状,与排山倒海的宣传,上行下效的说教,怎么看也都是天差地别;一向恪守现实主义写作态度的他们所欲写、所可写的真实事象,与当时必

须奉行的文艺政策,怎么搞也只能是南辕北辙。在那个被虚浮化、被狂热化也被扭曲了的时代,他们这些曾经坚定不移的革命作家,却怎么也无法挺立在漩涡般滚动的历史的潮头。

具体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可以分为两类。

“山药蛋派”作家中,面对甚嚣尘上错误倾向,赵树理是最具有抗争精神和批判意识的。1958年,他在山西晋东南蹲点时,就因反对“盲目冒进”与地方领导多次激烈论战;对所谓文艺放“卫星”的荒唐运动,也公开撰文坚决予以抨击。1959年,他又写了一篇《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大胆揭露了“大跃进”中的种种问题,并毅然上书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结果被转回他工作的中国文联。赵树理因此遭到严厉“批判”,被斥之为和彭德怀“反党意见书是一个腔调”,“大肆攻击三面红旗”。而赵树理却表示,“我最厌恶的是放空炮、不实在的坏作风,因为它一坑国家,二坑人民。”并不认错。60年代初,赵树理对当时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估计以及稍后的“大写英雄人物”的说法均提出过质疑。他“相信自己的眼睛”,所以,在这几年中,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而仅仅留下的几部作品如《实干家潘永福》、《卖烟叶》与剧本《十里店》中,都秉承着作家的良知,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阴暗面,而成为抵制极左路线的难得的“顶风”之作。正因为赵树理的不合时宜,后来他又多次在“整风”会上被整,1964年又被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并被调离北京“下放”回山西。到了“文革”一开始,他又被作为“黑帮分子”、“反动作家”第一个“揪”了出来,并在没完没了的“批斗”中被迫害致死,为自己的正直与真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山药蛋派”的其他作家,与赵树理则有所不同。面对错误思潮,他们尽管感到过不解,也曾经产生过茫然。但是,他们却像当时的大部分人一样,未必能保持多少清醒。对于许多自上而下贯下来的精神与现实的背离,他们更多的不是怀疑而是对自己是否理解、是否跟得上的检点。他们也希望能够适应形势、歌颂时代,能够以

当时倡导的所谓革命的、正确的准绳创作。但是，他们毕竟是与人民心心相印的作家，是对广大农民极为了解的作家；多少年习惯了忠于生活的写作，与那种塑造“高、大、全”英雄人物的几乎命令化了的要求，总是难以合拍。就是说，让他们抛弃自己的真切体验去粉饰现实，图解政治，至少是非不为乃不能也。所以，在此期间内，他们虽然也遵照当时的大方向、大气候编造过一些人物与情节，但每每成为败笔；而写的更多的一些“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人物，一些平凡百姓、普通农民的形象和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故事，倒至今仍然脍炙人口，魅力无穷。正因为这样，他们的创作与当时的政治调式也就越来越抵牾、越来越脱节，在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三令五申下达的严厉指示面前，他们也就越来越显得尴尬和难堪。终于在1964年掀起的全国性的大批“写中间人物”论的狂潮中，他们和赵树理一道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嗣后不久，就是《艳阳天》窜红，《金光大道》出笼，1966年发端，十年“文革”八个“样板戏”。“山药蛋派”迅速失去了高层青睐，而在历史的动荡中不可避免地蒙受重创，跌入低谷。

“山药蛋派”这一次的起落，固然与当时社会的风云变幻息息相关。但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回眸，还是有许多东西值得深思的。首先，“山药蛋派”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是政治的产物，功利色彩、宣教目的极其浓烈，文学整体职能的把握甚为片面，容易陷入浅白直露的窠臼或趋时与从属的境地，很难获得高层次的艺术突破和恒久不衰的文化价值。其次，审美情趣单一而凝固，接受精英文化的心态偏颇，认识短浅，对中华艺术的雅俗两翼缺少全方位承继，内容较狭窄，手段欠丰富，含茹大同小异，追求思想容量广阔厚重的自觉意识至为薄弱。再次，封闭多于汲取，自足多于开放，跨文化、跨国别的借鉴不够，更鲜少对世界现代文学思潮的客观考量，视野有限，涉猎局促，门户之见不可谓无，理论建树也随之之俯仰，切肤之言、逆耳之谈难觅踪迹。基于此，在当时的山西文坛，其他风格

的作品堪称寥若晨星，扶植作者、发表文章、培养第二代也多以这一模式为即定模式，当地的文学爱好者则亦步亦趋，争相效尤。这对于“山药蛋派”的雄峙一方、蜚声一时虽然起了很大作用，但就其对山西文学日后的发展而言，其负面影响也是绝不应该低估的。

3.

荏苒十年，“文革”过去，“四人帮”粉碎，极左路线受到清算，中国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拨乱反正，百废待举，文化事业同样也在呼唤着生机。彼时，鉴于旷日已久的摧残与扼杀，文学的园圃早已凋敝不堪，人民则以殷殷期待的热烈之情渴望着精神营养，任何一篇佳作都能在刹那间不胫而走，传遍全国。如果说，是共和国成立初始产生的巨大的艺术真空造就了“山药蛋派”作家的成功的话；那么，此刻摆在时代面前的，则是一个较之当年更为巨大的艺术真空。另外，国门的开放在那时还远未形成势头，伴着对无边浩劫的憎恶与愤恨，随之而来的多半只是广大百姓对“文革”之前某些健康岁月的眷恋，对被“打倒”的、被“斗臭”的、被“批”得一塌糊涂的一切一切的深切缅怀。在文学艺术领域，可以说，凡越是被否定过的、查禁过的，越是被定成“毒草”、打成“黑书”的作品，人们越是百般寻索，一睹为快；凡越是被挞伐过的、围剿过的，越是受过磨难、遇过不幸的作家，人们越是千倍欢迎，万分爱戴，真诚地等待着他们再谱新篇。

一方面是又一个巨大的艺术真空的出现，一方面是长期动乱造成的国人的逆反情结，正是以这样的社会需求和社会心态为基点，才导致了一大批被禁锢多年的文艺作品的“鲜花重放”，才促成了一大批终于熬出“文革”炼狱的作家们的东山再起。“山药蛋派”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